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王蕊, 王双全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 430070)

摘要: **目的** 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 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 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 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 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 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 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 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 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 另一方面, 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 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 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 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关键词: 宋代理学; 交椅形制; 变迁; 势中见理; 造物思维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4)04-0152-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4.04.016

"Perceiving the Reason in the Situation": The Elegant Evolution of Folding Chai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Rui, WANG Shuangqu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of design thinking mod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iving the Reason in the Situation" within the Li-Shi ideology as the research context, the work aims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society, culture and art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explore the aesthetic design thinking under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folding chairs and additionally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furniture history research, art history research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olding chair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combed. With the form, shape, style and components of the folding chai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hape of the folding chai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studied in detail.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itting position, etiquette, posture, and craftsmanship, the "Situation" of changes in use, rank, performance, and technique of the folding chairs was analyzed. In an era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ong 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i and scholars, the aesthetic design thinking behind the folding chairs in the Song Dynasty emerges from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s ideologies, the aesthetic preferences of the literati clas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itizenry, and the technical skills of craftsmen. These four elements collectively shape the aesthetic creation mindset of the folding chairs in the Song Dynasty, characterized by their emphasis on "practicality", "expressive symbolism", "adherence to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and "pursuit of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folding chair shape and structure; evolution; Perceiving the Reason in the Situation; creation thinking

理势辩证关系是王夫之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命题, 理、势蕴含多重内涵, 其中在《读通鉴论》里, “势” 的内涵域以形势、势力、趋势、态势和气势构成, “理” 的主要内涵有: 事理、客观规律和道理^[1]。笔者将“势” 理解为事物发展变化中能被直观感受到的外化表现特征, “理” 理解为引起事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内在影响因素与规律道理。本文旨在以宋代交椅为基础, 观交椅的风雅变迁之势, 见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下的审美造物之理。从宋代交椅演变发展及风雅表现出发, 深耕宋代造物美学文化之“理”, 以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为使命是研究宋代交椅的根源。

1 观“势”

交椅在历史长河中历经变迁与发展, 宋代交椅作为高型家具定型期下的椅具代表之一, 吸收了文人墨客的思想高度, 达到了宋时极盛的雅致品味, 交椅形制特征深受时代环境影响愈趋简、厚、精、雅。本章节重点是观宋代交椅的“势”, 以起居方式转型的坐“势” 观交椅的历史演化, 以封建制度沿袭的礼“势” 观交椅的等级之别, 以太师交椅演变的架“势” 观交椅的沉稳气势、以技法材料使用的巧“势” 观交椅的风雅形制。从分析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各个角度出发, 较为系统地梳理出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 为深入探寻影响其发生风雅变迁的内在动力提供了基础与途径。

1.1 坐“势”: “汉之胡床, 宋之交椅”

夏商周三代以前, 古人生活的室内环境里并无“椅” 的存在印记。最初可以称为“椅” 的是从汉民族传入的胡床物件, 胡床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坐姿转型

的开端, 它的体量小型, 棕绳编接座面的下方可折叠、上方无靠背, 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记载“今之交床, 制本自虏来, 始名胡床。隋以讖有胡, 改名交床”。因受帝王偏好的影响, 胡床在隋代以后依据其形制特征更名为交床, 因此胡床也被称为交床、交机或绳床。

胡床身为外来游牧民族使用的坐具, 它的引入逐渐影响到当地人们的生活起居用品发展, 进而演化出方凳、圆凳、条凳、马札、脚凳、坐墩、机凳、交机、长凳等矮型坐具, 提供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坐卧使用。魏晋时期, 床榻高度相应增加, 进而衍生出三扇屏风榻、四扇屏风榻等新式样。随后床、榻、凳、机、墩等矮型坐具在隋唐这一时期得到最后的极盛发展。坐具经历了筵、席铺垫式跪坐坐具, 床、榻矮型箱体式躺卧坐具, 椅、机、墩高型垂足坐椅具一系列变革过程。

椅具在两宋时期得到全力发展, 垂足高坐的起居方式定型下, 高型椅具被分离出来成为单独坐具的一大类别。交椅下半部承袭前代交机(胡床)椅腿部分的交叉可折叠形制, 在此基础上进行形制上的改良, 增加了靠背或扶手部件。其中栲栳样的圈靠背样式最早可追溯至低坐时代战国的弧形凭几, 其三个曲蹄形足落地支撑, 几面后部上脑在适度范围内向上拱起, 上脑与扶手呈半圈状供人倚靠。发展至唐代圈椅, 扶手与椅背相连的构造与交椅的上半部异曲同工。因此可依形制有无扶手来划分宋代交椅类别, 一是仅具有直立的靠背, 简约而稳定的直后背无扶手交椅, 常见于室内的学习或休息场所; 二是背部呈现圆形或弧形, 扶手也呈现柔和的曲线的圆后背有扶手交椅, 通常被达官显贵人士使用,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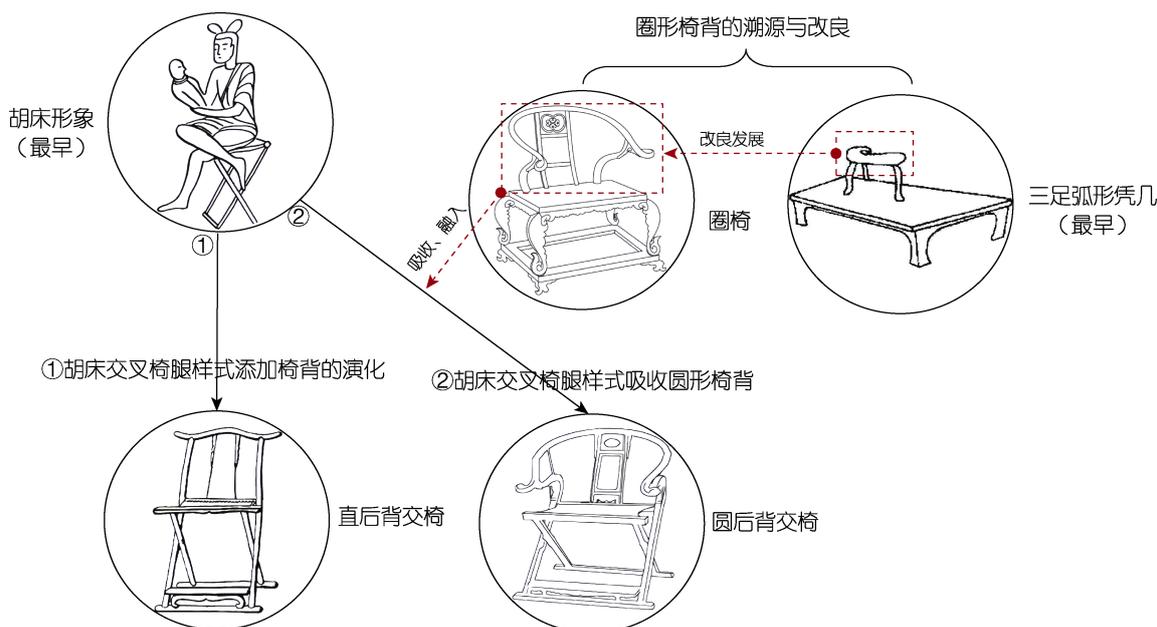


图 1 交椅的演化过程
Fig.1 Evolution of folding chairs

1.2 礼“势”：“单席”至“头把交椅”

“筵、席”两字至今仍在使用，作为座椅的初始形态，可溯源至中国的席文化。周朝以九尺之筵为建筑的计算单位，筵在古代是铺在地上的竹编大席，席则是铺在筵之上的草编小席，因此小席的等级地位在大席之上。又《周礼》记载“天子之席三重，诸侯二重”，可见设席的多与寡有等级次序之分^[2]，铺席的种类可见长幼尊卑礼制，如《礼记》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郑玄注曰：“席以四人为节，因宜有所尊。^[3]”即为长者设单席独坐，故铺设的“单席”表示使用者地位尊贵。

从席地坐至垂足坐的过渡时期，史书上记载的汉灵帝“好胡床”^[4]，交床（交机）承袭单席的等级礼制，尊为男人专用或者地位尊贵者使用的坐具。发展至两宋时期，垂足坐基本定型，根据《五王熙春图》、宋画《蕉荫击球图》、南宋《春游晚归图》、南宋肖照《中兴瑞应图》等描绘的景象，可看出交椅成为宋代

士大夫阶层，甚至是尊贵的皇帝、贵族、官绅大户外出巡游、狩猎专用，而妇女及下人是不可使用的，所以交椅也有“行椅”“猎椅”的称谓。交椅延续至尊性首席的礼制席文化表现在，一是交椅出现的环境场所与当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同行；二是交椅尺寸的体量感相对偏大，帝王或贵族等使用者坐在交椅上可以保持一种正襟危坐的姿态。陈设于室内时，交椅常被摆放在供桌或同堂的东西方位两侧，呈成对出现的情形，在江西乐平宋墓墓室的壁画中，交椅被置于厅堂中央区间，设置一桌两椅或背靠屏风，供男主人或贵客坐用，旁人站后方两侧垂手侍立，彰显尊卑有序礼制。相较于宋代交椅在日常休憩、饮食或出游娱乐的广泛使用，明代交椅适用范围相对狭窄，常被官员、贵族和皇帝用于朝廷、宫廷、贵族府邸等官方场合，长此以往，交椅沿袭“单席”为尊的等级秩序，且有了“头把交椅”（重要角色的代名词）之称，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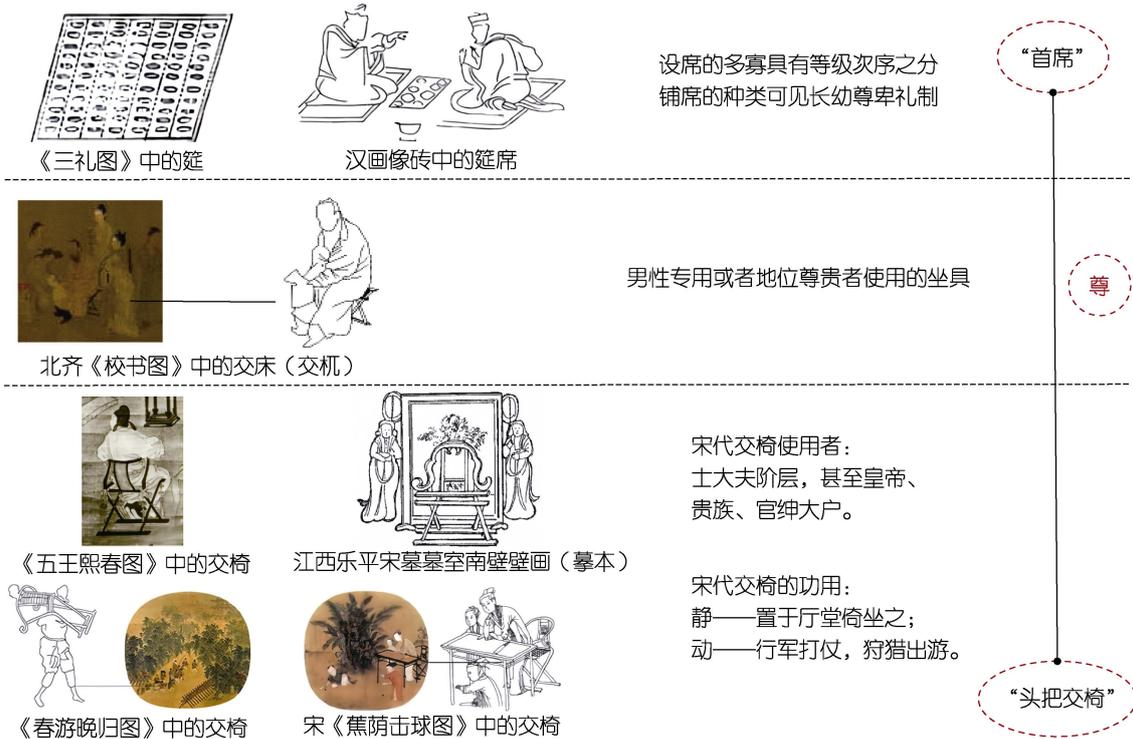


图2 “首席”到“头把交椅”尊贵象征
Fig.2 Symbol of dignity from "Chief" to "Number One Chair"

1.3 架“势”：“初见‘太师椅’，稳坐之”

黄朝英在《靖康缙素杂记》的第三卷中提到了“倚卓”，写道“盖人所倚者为倚”^[5]，指出“倚”不仅是椅具，亦是对宋人倚靠坐姿的形象表达，随着人们对舒适度的追求，椅背和扶手构成一个整体圆弧形的靠背，坐者的后背在倚靠坐姿中因大面积接触靠背而得到充分放松，宋代人称这种圆弧形的靠背为“栲栳样”，“栲栳”是指以柳条或竹篾编成的大圆筐。

“仰首而寝”且“达宦者皆用”的局面在宋人王明清《挥麈三录》有记载，由此衍生出“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即带有荷叶形托首的椅具，提供给官家仰首倚靠休息使用。查阅文献后得知明代太师椅是一种具有尊贵、庄重气质的家具，其座面上方带栲栳样椅圈，椅身有扶手、托首和精美装饰，成为明代正式场合使用的贵族流行家具。在宋画《春游晚归图》中，清晰描绘了侍从肩抗携带的交椅，它以荷叶托首借一长柄插在椅背后、椅背与扶手

相连的 π 形椅圈、可以开合的 x 形折叠结构椅腿组合构成, 此类造型即为宋代初见太师椅的典型形象。因此, 鉴于明代太师椅的形制可追溯至宋代, 太师椅最初形式与一种交椅相类似, 可见于宋代椅具的栲栳样。

从形制上看宋代交椅的栲栳样, 椅具整体线条呈现出上曲下直的外观, 相较于直靠背椅增加了扶手和荷叶托首, 扩大了靠背面积, 提高了椅背倾斜度。椅背与扶手相连, 高低落差一顺而下的圈形靠背, 使坐

者的背部、大小臂、肘部、手部都能够搭落置于太师椅的圈形椅背与扶手之上, 提升了使用者的安全感与舒适度。宋代交椅注重人体工程学形制、注重天然与质感风格的设计理念被明代太师椅所继承和延续, 太师椅的比例尺寸相对偏大, 其椅具中心位置较低, 与榻床的厚重感相呼应, 太师椅也因此观感上具有稳重、沉稳的视觉效果。发展至清代, 太师椅在外观和装饰方面变得更加华丽与繁复, 体现了清朝时期的宫廷文化和贵族生活的奢华,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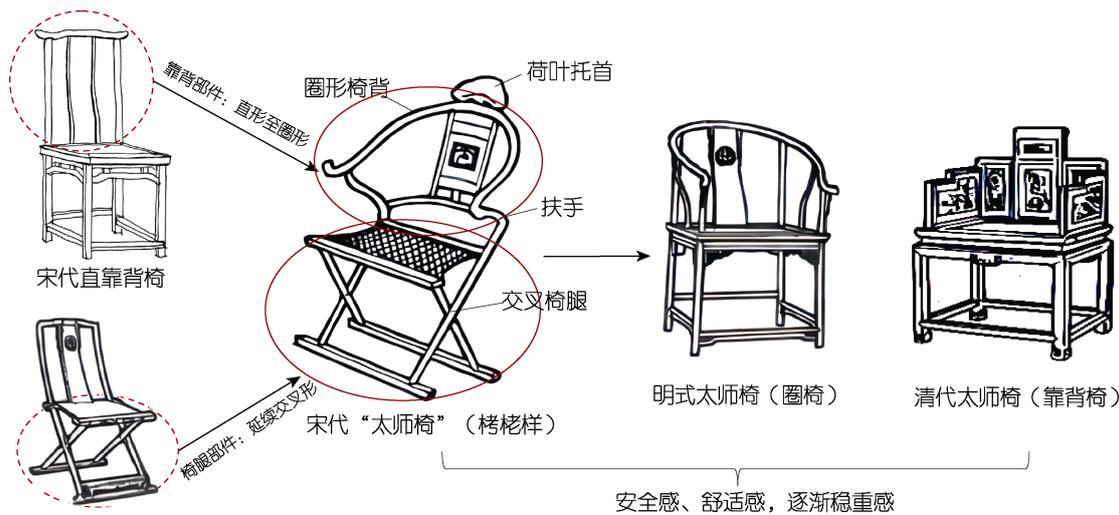


图 3 太师椅的发展

Fig.3 Development of armchair

1.4 巧“势”：“巧其思，巧其材，巧其饰”

宋代交椅的部件及结构体现出建筑构件演化及功用技艺考虑的巧思。杨耀先生^[6]曾说：“家具式样是由建筑形式演变出来的”，古代椅具形制与传统木构建筑具有关联性，“柱上架梁，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7]”的建筑木构架形式，被引入借鉴于仿建筑大木作形式的梁架结构椅具形制。交椅的腿部结构是直梁交结组合，前后椅腿交叉，在节点固定处形成转轴，允许椅腿的旋转和摆动。因此，从功用层面上看，交叉型腿部能够折叠和拆合，节省空间且户外出行时方便侍从携带。同时，交椅椅腿类似于建筑中起到支撑与稳定作用的柱子，围绕转轴形成多个具有稳定性能的三角形构成，与隋唐时期的箱形壶门结构相比较，从力学层面上看，梁柱形式更能传导座面压力，承重性能较高。

宋时期交椅的用材和装饰相辅相成，具有天然质朴及恰到好处的巧用。交椅的腿部特殊形制对交叉轴心位置有承重的要求，因此材料需要具备硬度轻的性能，交椅主体构架材料多用具有天然纹理且性能优良的硬木，例如极品材质黄花梨，其次是红木、楠木、上漆榆木等。座面选用植物草木或动物毛皮编织的软屉，一方面编织的弹性支撑、透气性、耐久性、可调

节性等性能满足折叠使用需求；另一方面织物编织的纹样与颜色、编绳编织的纹理与图案、藤编织的天然纹理同样具有适度装饰的效果。通过观察宋画和南宋宋墓浮雕绘画及摹本，宋代交椅的装饰之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示，一是椅背靠板上少量的如意云龙纹、山石龙凤等雕饰；二是交椅部件本身的组合来表现，例如流动线型的靠背具有曲直结合的美感，靠枕托首的荷叶形状具有雅致风貌，交叉形状的椅腿丰富了视觉美感层次，重复组合管脚枨具有沉稳性效果；三是宋代交椅附加的素锦椅披与室内环境和谐统一。到了明清时期，交椅出现无扶手类的躺椅、双人椅、三人连椅，呈现出多样化设计，同时造物工艺随着清王朝的没落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古韵与风雅。

2 见“理”

宋代椅具的外化变迁之“势”离不开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宋代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提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8]，务实性思维围绕的中心是尽其所用，交椅作为实践客体，各阶段的再设计与变迁处于“满足需求—催生新需求—满足新需求”的过程，这样的造物思维方式是有实用性与价值性的，不仅是造型与日常应用的使用价

值,还有内涵与象征意义的文化价值。从木建筑文献《木经》《营造法式》的影响价值可知,在科学理论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宋代木构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章节因“势”见“理”,分述交椅实践客体的创作主体,结合时代群众、统治阶级、文人阶层和梓人群体在交椅风雅变迁中的重要参与,挖掘宋代交椅变迁背后的造物思维方式。

2.1 “经世致用”时代群众的体用无间

“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审美观事也,事以成者势也”^[9],在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后,“势”就是当下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性表现,顺理则形成可行之势。人们起居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转型,映射出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椅具形制发生变迁则是必然趋向性的表现。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风流自赏的气韵精神、烟云水气的文化内涵、潇洒清远的人生态度,个性化的魏晋时代氛围下,衍生出了多元性的新型坐具式样。随后在隋唐时期的强盛国力催生下,矮型坐具得到最后的极盛发展。

发展到宋元时期,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0]证实了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北宋时期开放性与包容性使外来文化渗透并融入汉文化,伴随开放式街巷制度取代坊市制度与打开国门对外贸易的政策变化,宋人的起居生活、思想行为、礼教观念受到冲击,再加上佛教高型家具的传入,推动了中原人们的起居生活方式由席地转到垂足,跏坐、盘坐的礼仪逐渐退出主流思潮。两宋时代群众的思维方式是以“致用”性为导向,强调的是器物实用性特征。伴随椅具类别分野的趋势,功用特征逐渐明晰,例如床倾向于睡觉,更偏向私密性特点。榻与禅床同源,从文化涵义上与佛道思想结合,因此榻更注重禅意且附有文化内蕴,作为陈设常被安放在书房、厅堂,作为坐具亦可用来躺卧、憩息,深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椅、机、墩等坐具的功能则是满足以支撑腰部的力量、解放手臂的自由、释放腿部的压力等垂足而坐主流坐姿的需求。“致用”性思想贯穿宋代交椅创新设计始终,不仅满足宋代群众垂足高坐的坐姿需求,同时其易折叠性能还符合外出巡游被携带的需求。交椅在理性功用思维下的变革契合宋欧阳修“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11]”的“物用”观点,宋代交椅形式在功用层面蕴含人道精神,强调的是交椅自身的使用价值,“经世致用”的设计理念满足使用需求,尊重时代群众的体用和感受,在程朱理学的“穷理”美学观念下,与程颐从理学本体论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命题不谋而合。宋人对于务实性的要求在交椅形制上表现为去繁就简,从而呈现出理性之美、自然之美,交椅整体风格简约隽永。

2.2 “道本器末”统治阶级的等级之别

“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12],“得理成势”表明事物发展趋势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必然会表现出来,因为人们的活动构成了客观现实,所以现实过程的必然规律也就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活动之中。上承隋唐封建等级制度背景下,交椅沿袭前代部分椅具使用的行为活动,交椅的形成与演进发展必然遵循着历史规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

《周易·系辞上》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3]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认为“道”作为形而上的天理是处于至高无上的稳定状态,而“器”作为形而下的实体是具有易变性的。因此,宋代交椅(“器”)服从于统治阶级思想及社会礼制观念(“道”)。椅具蕴含礼器至尊的礼制精神,追溯椅具文化源头,从文献及墓葬中可知礼器为其根本,西周“藏礼于器”的传统建立后,参与祭祀活动的礼器地位至尊至贵。在礼器与宗法制度融为一体的背景下,礼器——椅具蕴含了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椅具的使用映射出等级、地位、名分和权力。封建等级制度让统治阶级的审美趋向及精神需求在官方的造物中得以体现,自上而下影响广大民众思想,进而这种尊卑秩序思想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从“首席”到“头把交椅”,太师交椅体现出“文与质”的内在统一,礼文化与程朱理学的“自然”美学观念交融形成“道法自然”“天地法象”的概念并蕴藏于设计之中。因此,象征尊贵地位、体现等级之别的礼文化内涵附着于交椅,并得到传承与发扬,直至今日有着“头把交椅”之说,能使用交椅是对身份和地位的衡量,交椅扮演着展示位高权重的角色。

2.3 “托物言志”文人阶层的审美意趣

“势因乎时,理因乎势”^[14],“时”是指事物当下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又“因其时,度其势”^[15],“势”是外显的客观存在;“理”则是认识和把握“时”“势”蕴含的内核。“时”“势”“理”三者相互联系又层层递进。“崇文抑武”国策拔高文人地位,宋代文人文化的快速崛起引领了时代发展,文人阶层逐步参与设计创作过程,其中造物观念蕴藏宋代文人阶层托物言志的审美表达、精神赋予与意趣享受。

“宋代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从美学的角度看,它的艺术格调是优雅的。”^[16]北宋后期,文人士大夫逐渐从创作中找寻自我价值,追求敬畏天地自然,留下谦卑的“格高”意境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尚境界彰显。通过前文对交椅架“势”的观察分析可知,一方面宋代文人文化赋予交椅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上圆下方圆靠背式交椅造型近似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交椅出现“栲栳样”特殊样式,其中独具艺术特色的荷叶托首

设计和谐适度,既彰显使用者至尊至贵的身份地位,又展现雅而尚礼、文不失秀的士人文化氛围。在宋代,儒释道其实都比较推崇一种返璞归真的简单朴实之感,“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简约美学观念自上而下贯彻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养心亭说》记载“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17]”明确了没有私欲,圣贤的光明品格得以确立,则能通晓天下事理。周焯在宋代文言轶事小说《清波杂志》记录的“祖宗家法”直接表明宋代王室是崇尚质朴简约,摒弃奢靡之风。宋画里竹、藤、草、石等自然材料运用的“天然去雕饰”禅椅,可以看出宋人在程朱理学“无欲故静”思想下形成静谧清淡、内敛平和的“主静”禅意审美,其在宋代交椅形制表现:一方面曲直线条相结合构成的椅背造型自然流畅,显得典雅别致;另一方面榫卯结构与部件自身的装饰性表达去除造作伪饰,显得大方淡雅。工匠借造物与技法,文人士大夫借使用及场所,寄格高、淡然心境于宋代交椅,抒发追求简约的内求与寡欲情感,表达尊崇自然、淡然超脱的精神境界。

2.4 “尚巧达善”梓人群体的匠心精神

“势之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日天”^[18],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是“势”与“理”相结合的外化表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只有遵循固有的运行规律,才能趋利避害。天是存在、法则、运动变化的整体^[19],性善是天以上的品格,遵循天赋的善性行动是人天理的感悟与践行,是宋理学“格物穷理”思想的彰显。

古时称“梓人”为木匠,作为营建木构客体的主体,同样是造物中创新设计的主体。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市井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冲破观念的束缚,重视工、商的思维观念改变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消费与精神审美需求,手工行业快速发展,工匠技艺愈发成熟,故宋代交椅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世俗产物,也是诠释美的艺术作品,交椅外观风格蕴含的审美意象和意境不仅表达自身修养中的淡泊名利、儒雅风尚,同样是梓人群体地位及待遇提高后,在积极创作的主体意识觉醒之下形成创新设计的文化自觉。交椅在制造中展现出自然高品质用材、混搭多组合构件、创新和谐性风格,从技术、技能、技艺多方位体现梓人群体的“尚巧”。交椅椅背倾斜和弧度的角度调整,靠枕和管脚枱的创意添置,可持续性天然用材,雅致隽永风格特征等各个方面都彰显“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至美达善”的心灵境界,朱熹^[20]言:“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美源于善,至美需要达善,无善,则美空为形式。梓人在追求“尚巧”之上达到至善境界,将物质性专业实践过程与精神性生命存在方式相连接,形成专业精神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达善”修养,人与自然、功能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结合的交椅可看作是梓人群体具有匠心精神,从而实现道技合一的创作实践。

3 结语

风雅气韵弥漫在两宋的生活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抽象的民族精神蕴含在具象的民俗、工艺和器物中,与明代交椅的“华丽雍容凝雅韵,曲线曲折尽风流”相比,“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可以诠释体现在宋代交椅形制上的特征,宋代交椅所具备的思想性、审美性及功能性与其简约的造型、素雅的风格、自然的用材,以及持续展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工巧密不可分。观“势”,见“理”,通过观察宋代交椅形制变迁的过程,了解古代椅具设计的理念、构造和材料运用,洞察其背后的审美观念、造物思维及理学内涵。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家具和工艺品,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当代设计,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荣. 王夫之理、势概念的内涵再梳理——以《读通鉴论》为中心[J]. 社会科学论坛, 2017(12): 41-55.
LIU R. Re-combing the Connotation of Wang Fu's Concepts of Reason and Potential—Focusing on Reading as a Mirror[J].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2017(12): 41-55.
- [2] 邱汉周, 刘云. 论中国交椅的礼制文化[J].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4(2): 105-109.
QIU H Z, LIU Y. On the Etiquette Culture of China's Top Position[J]. 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34(2): 105-109.
- [3]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RUAN Y. Annotations on the Thirteen Classic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4] 邵晓峰. 中国传统家具和绘画的关系研究[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05.
SHAO X 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Painting[D]. Nanji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05.
- [5] 黄朝英. 《靖康缙素杂记》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HUANG C Y. Jingkang Zuxiang, Volume 3[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6] 杨耀. 明式家具研究[M]. 2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YANG Y. Research on Ming-Style Furniture[M]. 2nd ed.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2.
- [7]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LIU D Z.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M]. Beijing: China Stat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ress, 1984.

(下转第165页)